

清初统治者，为巩固其统治地位，在对待以汉族文化代表的文化典籍上，除实行箝制政策外，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。他们组织译刻了不少汉文经史、子部儒家和文学著作，供皇室及满洲贵族子弟学习。承办单位先是内国史院，其编刊的具体情况，尚待查考。入关之后，成立各馆，组织翰林编书，由原明司礼监经厂的刻书工匠承刻。所以，顺治一朝所刻书籍大都保留着明晚期内府刊书、装潢的风貌。康熙初年，内三院撤消，成立由上三旗包衣组成的总管内务府，刻书任务便由内务府属下的武英殿造办处承担。康熙十九年，设立武英殿修书处于浴德堂，从组织上初步加强了内府刊书能力，但仍在武英殿造办处属下。

康熙皇帝好学敏求，留心典籍。他起用了一批汉族中具有真才实学的儒臣，令其开馆修书，初期多是五经四书和经解之类。康熙四十年以后，编书种类日益增多，修书处尚属初创，刻书能力有限，一些编就的书往往令地方官绅们输资承刻于扬州诗局和苏州诗局。如：《全唐诗》为通政使曹寅所刻，《历代赋汇》为詹事府詹事陈元龙所刻，《佩文斋咏物诗选》为翰林编修高輿所刻，《历代题画诗类》为翰林院编修陈邦彦所刻，《历代诗余》为司经局洗马王奕清所刻，《佩文斋书画谱》则为候补主事王世绳等人所刻，《御批通鉴纲目》为吏部尚书宋荦所刻，《佩文斋广群芳谱》为河南道监察御史刘灏所刻，《全金诗》为内阁中书郭元釭所刻，《历代纪事年表》为翰林检讨马豫所刻，《康熙字典》则为翰林院侍读陈世倌所刻，甚至康熙帝的御制诗初、二、三集，也是由宋荦、李煦分别承刻于苏州诗局和扬州诗局。这些承办的官绅都以校刻天府秘籍、列名简末为荣，因而十分用心，选用名手精写上板，细心雕刻，以上等纸墨刷印而成。字体工整端秀，刻印精绝，形成特有的风格，颇得康熙帝的赞赏，时人也誉之为“康版”。清人金埴称：内廷御籍，多命曹寅督办，其“雕镂之精，胜于宋版”，又云：“自康熙三四十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，海内好书有力之家，不惜雕费，竞摹其本，谓之欧字。见刻宋字书，置不挂眼，盖今欧字之精，超轶前古，后世宝惜，必曰‘康版’，更在宋版书之上矣”^③。这时，武英殿承刻的书虽然不多，但已完全摆脱了明经厂本的影响，形成了工整、精致、典雅的特有风格。

康熙五十年以后，内府编刊书籍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。不仅种类多，卷帙浩繁，刷印技术也很全面。如《古文渊鉴》、《御制耕织图》、《万寿盛典初集》等，是当时五色套印和版画插图书的优秀代表作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、《律历渊源》一百卷，都是铜活字摆印而成的杰出作品。《皇舆全览图》代表了当时测绘技术的先进水平，对亚洲地区舆图测绘学产生了深刻影响，在中国测绘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康熙五十六年、六十年，分别颁谕理藩院，令其组织刊刷蒙文《甘珠尔经》和藏文《甘珠尔经》。这些编刊活动充分显示了当时内府修书、学术研究及雕板印刷方面的高度水平。雍正七年，正式改武英殿造办处为武英殿修书处，并准予铸造印记。从此，武英殿修书处升格，成为清内府刊刻书籍的专门机构，标志着内府编刊书籍进入了更为繁荣的时期。此间，除完成了康熙帝遗留下来的未就书籍，还充分利用了清宫积蓄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，编纂了《硃批谕旨》、《上谕内阁》等史书，并编辑了《子史精华》、《骈字类编》等百卷以上的类书，编刊了雍正帝选编的《二十八函经》及佛僧语录多种，组织僧众编刊汉文《大藏经》（亦称《龙藏经》）。除《大藏经》外，其余书籍都是武英殿修书处承刻的。所刻书籍字体方整，刀法匀净，装潢精佳，悦目醒神。风格典雅庄重，是康熙时期风格的继续和发展。

乾隆一朝，是清内府编刊书籍的鼎盛时期。编书种类和卷帙都超过了康熙之际，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财力、人力的富有及编书的气魄。乾隆四年，汉文《大藏经》告成。同时，校刻了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二十一史》等大书。此间，时人往往将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书统称为“殿版”书。继之，又陆续编刊了《明史》、《大清一统志》、“九通”等经、史、子、集各书，枚不胜数。还